

Dilemma and Solution :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in the Horizon
of the Educated

受教育者视界中的 农村职业教育困境与破解

Dilemma and Solution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in the Horizon of the Educated

张力跃 著

Dilemma and Solution :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in the Horizon
of the Educated

受教育者视界中的 农村职业教育困境与破解

张力跃 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学术性和思想性较强的职业教育著作。

作者主要研究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问题,以农民微观的个人教育选择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农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为研究背景,分析了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意愿形成、践行与实现过程及其对应的农村职业教育生态,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村职业教育兴衰起伏的历史考察,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了当代中国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根本诉求,以合理化来说明农民从改革开放初期热衷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逐渐不愿意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这一目的性行动的根本动因。整个研究视角新颖,材料丰富,结构严谨,富于创见,对于促进职业教育学研究的学术自主及深化对农村职业教育问题的认识具有深远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受教育者视界中的农村职业教育困境与破解/张力跃
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 4

ISBN 978-7-5618-3879-2

I. ①受… II. ①张… III. ①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133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网 址 www.tjup.com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 × 239mm
印 张 13.5
字 数 329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2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171)资助

1.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课题“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意愿的形成、变化与实现过程及其对应的农村职业教育生态变迁”(10YJC880155)

2.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农村职业教育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研究”(EJA100437)

3.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10JJD880007)

序

农村职业教育是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我国最大的国情是农业人口众多,“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建国起一直到今天都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倍受看重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自2003年以来连续7次以“三农”为主题。现在的一个共识是,政府和社会都意识到,要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将集中于土地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在这一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被赋予了很大的期待。今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是政府面对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提出的明确号召,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农村职业教育问题的认识和思考,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这本书四年前力跃在跟我学习期间就开始构思,其后的选题、搜集资料、实地调研到动笔写作,我们一直在沟通。这期间他下了很大功夫,扎下头来跑了很多地方,我也一直在关注这项研究,看看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几年下来,丰厚的一部书稿捧到我面前,我不由感叹:就冲这份劲头,能沉下心来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不很时髦的命题,我是欣慰的。书稿读罢,感觉还是有一定分量,反映出几个特色。

这几年来职业教育界一直在探讨吸引力的问题,中等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主体是农民子女,如何吸引农民心甘情愿地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是理论界和职业教育办学实践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本书以农民微观的个人选择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重点在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过程中的根本考量。本书集中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农民大规模、长时间地疏离职业教育?农民对子女的职业教育选择行为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制约?在结构性的限制中,农民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在转型期前后与农民的教育期待有着怎样的重合与落差?在归因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策略的核心是要张扬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在此前提下增进个人教育选择的制度安排,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让农民真正感受到子女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利益所在,最终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由设计模式向内生模式转化。著作的着眼点选在了农民的个人职业教育选择,着力分析了已在和潜在的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意愿的形成、变化与实现过程,相对于数量众多的宏观政策研究和中观办学模式研究,该研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更具根本性,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深化了对“农民的选择是否理性”命题的认识。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运用了新的理论工具。改革开放 30 年来,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跌宕起伏,随着社会变迁兴衰变化。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很多研究者都是就事论事,局限于从教育内部寻找原因,对于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时代变迁分析不够,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所引发的农民的就业观念、教育层次的高移化、学生就业体制变迁、独生子女政策等对农民子女教育选择的重要影响关注不够,没有触及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症结。这本书以社会学视角观照农村职业教育,从分析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入手,揭示以农民子女为主体的农村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对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以职业结构的分析考察农民对子女受教育后果的愿望指向;从劳动力市场目前的生态结构来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学生的实际流动状况。由此发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功能发生了由“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的蜕化,提出社会结构变迁是农村职业教育兴衰的主要动因。作者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村职业教育兴衰起伏的历史考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当代中国农民对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根本诉求,所采用的跨学科路线,为职业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工具,解释更为深刻。

再次,这本书也体现了鲜明的实证风格。职教研究者最怕的是待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我平时总告诫我的学生,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离开实践的职教研究毫无价值。就我的了解,力跃这几年来跑了不下 30 所学校,对 1 500 多名教师、3 000 多名学生和近百名家长、20 多名政府官员和十几家企业进行了大范围调研,涉及 5 省 8 县。不了解实际就没有发言权,我国的区域差异显著,同样一个结论换一个地方就可能成了谬论。这本书里有大量涉及东西部对比、普职对比、城乡对比的数据,采集了丰富的访谈资料,让我们对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现状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把握,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农村职业教育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

农村职业教育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其存在问题的分析和解读决不可能是一本书能承担得了的,也正缘于此,这本著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尽管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足和缺陷,我还是肯定力跃作为一名青年职教研究者付出的辛勤努力,赞赏他对农村职教事业的拳拳之心,鼓励他继续走下去。农村职业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事业,我在这里也呼唤更多的学者关注它、研究它,让农村职业教育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0 年 11 月 8 日于上海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4)
一、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	(4)
二、关于农民个人(家庭)教育选择的研究	(10)
三、关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研究	(12)
第三节 研究意义	(18)
一、理论意义	(18)
二、实践价值	(18)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研究设计	(20)
第一节 概念诠释	(20)
一、农村职业教育	(20)
二、社会结构	(20)
三、农民	(21)
四、个人教育选择	(22)
第二节 理论假设	(24)
一、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	(24)
二、农民具有理性选择能力	(30)
三、社会结构规制着个体选择	(33)
四、实现阶层跃迁是农民对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	(35)
第三节 研究设计	(36)
一、研究方法	(37)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38)
第四节 研究框架	(38)
第二章 个人教育意愿形成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生态	(41)
第一节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及趋势	(41)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41)
二、当代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征	(43)
三、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	(46)

第二节 农民的阶层位置与教育期待	(47)
一、农民阶层处于劣势地位	(47)
二、教育是农民子女实现代际跃迁的主要途径	(50)
第三节 农村职业教育的蜕变与迷茫	(56)
一、办学功能之殇: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	(56)
二、办学方向之惑:升学还是就业	(65)
第三章 个人教育意愿践行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生态	(73)
第一节 我国职业结构的趋高级化及职业地位的获得	(73)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	(73)
二、教育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79)
第二节 什么职业是好职业	(81)
一、农民的职业声望评价	(82)
二、农民(对子女)的择业观	(87)
第三节 农村职业教育的局限与不适	(92)
一、办学层次之限:拿什么和高等职业教育竞争	(92)
二、专业设置之钝:怎么与市场需求合拍	(97)
第四章 个人教育意愿实现中的农村职业教育生态	(101)
第一节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特征	(101)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10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变迁	(103)
三、我国现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105)
第二节 农村职业教育学生就业模式的转换	(106)
一、计划体制下的统分统配模式	(107)
二、市场配置下的多元就业模式	(109)
三、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职业教育学生就业的发展方向	(111)
第三节 农村职业教育的闭守与孱弱	(112)
一、培养质量之弊:缺乏实践技能,难受市场青睐	(112)
二、信息获取之隔:与输入地疏离,就业信息不对称	(117)
三、分割管理之锢:县域职教资源分散,难以做大做强	(120)
第五章 怎么规引:社会理性与个人理性的统一	(125)
第一节 困境归因: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国家需求与个体利益诉求错位	(125)
一、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宏观需求	(126)
二、农民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的风险	(126)
三、农民的理性选择	(128)

第二节 正确定位:重新认识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	(130)
一、一个不得不说的争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职业教育价值观	(130)
二、着眼于减少失业和保障就业的新视角	(132)
第三节 尊重个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核心策略	(134)
一、创设有利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	(134)
二、增进个人教育选择空间的制度安排	(141)
三、拓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面向	(148)
四、以实践为导向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	(155)
结语:张扬“沉默的大多数”者的个人利益	(160)
一、农民对子女的职业教育选择具有理性	(160)
二、社会结构变迁是农村职业教育兴衰的主要动因	(160)
三、不能用国家利益掩盖农民及其子女的个人利益诉求	(161)
四、未来的研究课题	(162)
参考文献	(163)
附 录	(172)
附录一 社会分层结构的内涵及相关理论概述	(172)
附录二 个人教育选择理论概述	(180)
附录三 教育分流概述	(186)
附录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	(188)
附录五 贵州 P 县职业高中校长访谈记录	(192)
附录六 贵州 P 县 L 职业高中校长访谈记录	(194)
附录七 河南 X 县教育局访谈记录	(196)
附录八 吉林 N 县职业高中学生访谈记录	(201)
附录九 吉林 N 县职业高中教师访谈记录	(202)
附录十 贵州 P 县政府下达文件要求初中学校为职业高中提供生源	(204)
后 记	(205)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21 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是否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个问题上,政府决策部门和学者的意见都是统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可谓不重视,学界也曾援引发达国家如何发展职业教育及其重大作用等进行了阐述,我们可以从连续几次召开的间隔极短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多个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中感受到这种强烈期待^①。但从现状来看,包括农民在内的大部分老百姓并没有同步响应,职业教育尤其是国家大力提倡发展的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困难,处境艰难^②,积极的政府号召和低迷的百姓反应间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一次座谈会上,吉林省农村职业教育的“开山人”之一,原农安县教育局副局长姜文焕说起 20 年前刚刚兴办职教时某职业中学破房子、漏屋子、秃台子、破猪棚般的校舍如今已改造成标准的教学大楼,但是因招不进学生,只有 20 多名学生还分设 5 个专业,由 50 多位教职工陪着“太子”读书。如今这所学校维持不下去了,他们正与一乡村养殖专业户协商,准备利用校舍重开猪场。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① 早在 2004 年底的教育部工作会议上,前教育部长周济就提出,2005 年中职招生要在 2004 年的基础上增长 100 万,并且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逐步实现中职与普通高中规模大体相当的协调发展。2005 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明文规定,到 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 800 万人;“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 2 500 多万名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1 100 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其后,国家发改委在《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中明确表示,中央将对职业教育投入专项资金 60 亿元,并重点支持建设 1 000 所左右县级职教中心(或县级职业学校)和 1 000 所左右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高目标加上高投入,不仅使职业教育有可能在规模上再次和已经规模庞大的普通教育匹敌,而且使得职业教育对全社会的影响陡增——这些学生大多不以继续升学为出路而以就业为目的,因此其发展状况事关上千万人的就业。这样,职教发展的问題,就不能不成为社会敏感问题了。(详见苏扬:《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若干敏感问题刍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8):4-8 页)

② 1998 年以来,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逐年下滑,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2004》数据,2004 年,全国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45 万所,比 1998 年的 1.7 万所减少 2 600 多所;全国初中毕业生 2 000 多万人,其中有 822 万人升入普通高中,566 万人进入职业学校,两者之比接近 6:4,与 1998 年普通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占高中总招生数 53.12% 相距甚远,此外尚有 700 万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未接受培训就直接进入社会。近几年是我国学龄人口高峰期,高峰过后中等职业教育的形势将更为严峻。(详见于伟,张力跃,李伯玲:《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对策》,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16-124 页)

一份对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情况的视察报告指出:作为堂堂农业大省的吉林近几年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大面积萎缩、滑坡,多数县、市、区已经没有农村职业学校和涉农专业。尚存的农村职业学校不少挂“农”字之名,行“非农”之实,部分农职高中已干脆普教化。总之,农村职业学校和涉农专业正面临比其他职业学校和专业更为严重的生源危机和发展危机^①。

笔者通过对5省(浙江、山东、吉林、河南、贵州)的8个县的调查发现^②,像吉林省某职业中学这种国家重视但经营惨淡的学校,在全国大部分县域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量存在,调查所涉及的吉林S县、河南X县、贵州P县2004年的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比例分别为4.6:1、2.2:1、6.2:1,普职结构极不合理,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当年全国有700万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未选择升学直接进入社会。职业教育的潜在需求并没有转化为现实需求,这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亟需理论界给予回应。

从整个职业教育来看,又以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指县域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最为跌宕起伏,困境也最为深重,极具代表性。

农民子女是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生源^③。通过史学观照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能够实现职业获得,而且由于连带着承认文凭(中专)、加入城市户口而能够实现身份变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身份意味着地位,由农民变为干部,两种身份附着着不同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种身份的转换使得农民子弟的阶层地位得到了提升。与此相应,同期的农村职业教育也取得了辉煌的发展^④。这里需要引起

① 刘海,于志晶,陈衍:《回眸——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报告》,62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② 书中所采用的数据除特别注明,全部来自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课题“受教育者个人教育意愿的形成、变化与实现过程及其对应的农村职业教育生态变迁”(课题批准号10YJC88015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农村职业教育继续改革的必要性与动力、阻力及其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EJA100437)调研的数据。

③ 据重庆市教科所对2000年32969名中等职业学校新生的调查,家庭月收入低于1500元者占94.6%,父母职业为农民、工人、无业、个体者占96.4%;据教育部高教司了解的情况,高职院校学生中,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水平的家庭子女占92%(详见杨金土:《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载《教育与职业》,2004(7):4-7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的一项调查,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家庭中93.65%属于中等以下收入,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家庭中95.93%属于中等以下收入。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挑战》,载《职业技术教育》,2007(21):18-49页。

④ 20年间,相对于城市职业技术教育和其他教育层次的改革而言,中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及其改革下手最早,典型最突出,经验最为丰厚,所创造的奇迹最令人叹为观止、赞叹不已,和农村职业教育相关的“国家级工程”也最丰富多彩。除了“燎原计划”之外,我们还能数出诸如“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绿证工程”等指标恢弘、让人振奋的伟大工程。因此有人评说: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农村职业教育模式、典型辈出的时期。详见刘海,于志晶,陈衍:《回眸——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报告》,58-60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注意的是,并不是那时的国家投入比现在多,教学质量比现在高,关键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1985年以后随着市场化的引入,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模式逐步由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分转换为自主择业为主的多元模式,并且各行业的入职门槛逐渐提高,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已经不能保证必然的职业获得,而且与高等教育相比,进入的职业其声望也差距甚大。1998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福音般地激发了农民长期积郁的腾达之心,也彻底将职业教育由地位教育降到了生存教育的位置,开始逐步滑坡。

目前学界对这种困境的解读,大体分为三类,即政府功能发挥不足(投入不够、缺乏相应法制建设、信息服务滞后),农村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低下(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训基地少、课程的学问化),农民观念落后(受传统观念影响,轻视职业教育)等。这些归因囿于就事论事,对于诸如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的重大起伏,现阶段全国大范围的农村职业教育招生低迷等问题缺乏解释力。我国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说过:“50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一种经济问题或是社会问题,不是局限于某一乡、某一县、某一省,而是普遍化了,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较长时间解决不了,这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也不是某个领导的问题。”^①要破解农村职教的深层次症结,理论界亟需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解析,为农村职教遭遇的时代难题提供深刻诠释。

对农村职业教育这种巨大变化,如果仅仅从职业教育自身或者是教育体系内部来寻找原因,难免会陷入就事论事、雾里看花的窘境。一种重大教育现象的形成和演变,常常是“教育外的事情比教育内的事情更重要。”^②在这里我们需要跳出教育学分析评判的视角,而用社会学的理论和角度去分析历史进程中的职业教育问题。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村职业教育目前遭遇的困境原因主要是在外部,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其办学功能发生了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的蜕变,从而与受教育者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落差。国家从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社会宏观需求出发,需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民(农村职业教育对象进行教育选择的主要决策主体)由于位处社会阶层底部,接受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农民的主要教育期待,但农村职业教育却由于办学功能的蜕化无法承担这样的期待。

按照实用理性的观点,教育首先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利己需要,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人类最基本的理性形态即

①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② 赵成:《一个值得重视的职业教育研究视角》,载《职业教育研究》,2006(1):38-39页。

实用理性,人们选择教育、发展教育,是理性计算的结果。^①在当今,职业直接体现着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在对职业的追求中,人们发现,文凭最低,排在“等候队伍”之尾的人将最后接受服务(他们甚至被排在劳动力市场之外)^②。现在人们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力,是不是接受职业教育反映了人们对职业教育能够给人们带来什么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于对已经接受了职业教育的人的处境的观察,以及把这些人与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的命运进行比较后的权衡考虑。职业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在改变人们社会阶层结构上的局限性决定了我国职业教育时下不会有人期望的那样大的发展,相反却有可能继续萎缩,回到常态。”^③从劳动力市场传回的消息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包括其子女)的职业教育选择,农村职业教育遭到受教育者的冷遇实属“情理之中”。

这种演变让我们不能不重视社会变迁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社会分层对农民为子女职业教育选择的深层规制,这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域。本研究力图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做出明确剖析:农民对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是什么?他们希望子女流动到哪些职业?农村职业教育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中如何发生了从能到不能的变化?最终通过农民对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受社会结构深层规制的分析,阐明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农村职业教育遭遇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国家的宏观发展需求与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错位,而要破解困境,需要消解阻滞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不平等机制,增进个人职业教育选择的制度安排,追求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协调统一。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梳理与反思

根据课题的内涵,本节内容分“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关于农民个人(家庭)教育选择的研究”、“关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研究”三个主题进行。

一、关于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社会分层的著作和论文显著增多,其研究几乎涵

① 于伟:《现代性与教育》,189-19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法]玛丽·杜里-帕拉,阿涅斯·冯·让丹著,钟启泉,赵中建译:《学校社会学》,45-5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 庄西真:《社会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载《教育发展研究》,2006(11)A:1-5页。

盖了社会分层理论的所有方面^①。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分层研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刘精明,2005)、《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陆学艺,2004)、《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李强,2002)、《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朱光磊,1998)、《中国社会分层》(李培林、李强、孙立平,2004)等,主要论题是: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研究,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教育与社会分层具有高度相关性

教育与社会阶层的相关性是指,一个人的教育水平越高,其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层次越高,个人社会地位也越高。教育是一个较为恒定的影响社会阶层地位的因素,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教育程度高低与人们的社会地位高低相对应基本上总是成立的。

就教育与社会阶层地位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关性极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层次增多,由原来的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②转变成层次相对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

① 例如(不完全的列举和归类):关于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的研究(何建章,1990;陆学艺,1992;戴建中,1995;李春玲,1997),职业分层和收入分层的研究(李强,1993;葛延风,1994,1995;沈红,1995),地位结构观视角的研究(路风,1989,1993;孙立平等,1994;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培林等,1992;李汉林,1993;卢汉龙,1996;李路路,1996),转型社会精英替代模式及分层机制变化的研究(李金,1994;张厚义、刘文璞,1995;戴建中,1995;李路路,1996,1998;李强,1997;宋时歌,1998),阶级阶层与利益结构的研究(黄伊凡,1989;冯同庆、许晓军,1993;李培林,1995;孙立平,1996;郑杭生等,1997),网络结构观视角的研究(王春光,1995;张宛丽,1996;李培林,1996),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认同的研究(于显洋,1991;蔡禾、赵钊卿,1995;卢汉龙,1996),职业流动模型以及大量有关农民流动的研究(陈婴婴,1995;李春玲,1997)。详见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9(1):101-109页。

②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分层的指标有四个。一是按照居住地或户籍类型,全部人口可以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享有义务教育、医疗保障、住房、食物补贴等一系列福利,而农村居民则被完全排除在这种福利体制外,只有一小部分农村出生的人能够通过参军、婚姻或考上大学等途径变成城市人口,从而能够在城市工作。二是按照所有制结构,分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企业保证职工的终身雇佣、医疗保健、养老、住房、子女入托、入学,乃至对职工的生、老、病、死、残都负责到底。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在这些福利的享有上面有所差别,而农村集体所有制生产单位成员则完全享受不到这些福利。三是按从事的职业可以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干部通常从事管理或专业工作,有培训和提升到党政部门领导位置的机会。与此相反,工人基本上没有升迁的机会。在农村,领取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被看作国家干部,即使是那些不领取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被认为比普通农民具有更高的地位,而农民则是地位最低下的群体。四是根据出身背景和个人的政治态度,或被划为革命阶级,或被划为反革命阶级。除了第四类标准所确定的革命阶级与反革命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异,因为夹杂了极端的政治因素而不具有共性外,其余三个标准的共同点是,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地位差距,而从1957年以后,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就一直是造成社会地位分化的重要因素。详见 Bian, Yanjie: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载“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2(28): 91-116页。

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把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①,具体是:①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占就业人口数的2.1%,其中乡村占的比例较少,城市占的比例较大;②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③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占1%;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包括教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占14.6%;⑤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即办公室主任、文书、计算机操作人员、会计、出纳,这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里都有,规模比较大;⑥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⑦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主要是第三产业的员工,占11.2%;⑧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⑨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也就是我们说的农民,包括流动人口,农村社会单一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已经分化,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和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又可以将其细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农村干部和无业者7个阶层^②;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只能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与此同时,在中国也形成了与三次产业相联系、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结构,各阶层在这一结构中的序列地位渐趋稳定。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第一产业主要包含农业劳动者阶层;第二产业包含了占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第三产业中商业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重大。

根据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清楚地看出,教育与社会阶层存在高度相关性。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显示,到2000年时,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城市为12.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而农村仅为7.7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城乡之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为4.6年。农村劳动力主要以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中各行业为其职业,而2000年中国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6.79年,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从业人员比例超过了95%,其中具有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比例仅为43.1%,具有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员占40.3%,两者之和为83.4%,扫盲班和未上过学的人员占到11.8%。也就是说,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以具有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为主体的,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劳动力。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教育水平低于第二、三产业的情况相适应,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地位较低且明显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因此,根据已有研究,一个可信的结论是,第一产业的主要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初中后教育阶段上的积累低于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其所处劣势社会地位高度吻合。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② 孟天运,尉建文:《山东地区农村社会分层的个案研究》,载《东方论坛》,2003(2):78-82页。

(二)教育影响个体的阶层地位及流动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开创了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先河,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对社会分层的本质、决定要素、形式等做出了理论解释。依照韦伯的理论模式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理论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布劳—邓肯模型,该模型认为地位获得主要是关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社会地位的影响,认为在经济发达国家,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73。在他们看来,社会分层结构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而某种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代际之间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职的影响。教育将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为,在工业社会,教育制度成为影响一切的重要制度,科层制的扩张导致选人用人日益依靠教育,受教育的程度或文凭学历等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

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表现为教育是导致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主张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的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 H. Turner),代表作是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1960)上发表的《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教育使社会地位升迁的两种模式》一文。关于教育可以导致社会流动的理论解释是功能论与冲突论。

教育与社会流动已有大量研究,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对美国社会分层进行的实证研究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在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人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教育程度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职业选择,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较为复杂的劳动和较为体面工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根据美国学者罗伯逊(Ian Robertson)等的研究,在美国,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首推受教育程度;其次为其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业地位,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直接影响比前面二者小。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在不同国家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结果是有差异的,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收益主要是声望和荣誉性位置,而发达国家则主要是物质方面的。虽然有这样的差别,但竞争、筛选和能力本位的奖励制度是影响社会分层的基本因素,在这一点上,不同国家具有共同的特征。不同级别和水平的教育对人们的社会分层都有较大影响,尤其是高等教育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阶层地位是人們在一个社会的等级或阶层序列中的位置。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导形态,也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最简化的类型是城乡人口流动。从社会阶层来看,城乡居民一直处于界线分明的社会分层状态,农村居民无论是在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隔绝时期,还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时期,农村居民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下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划分,在当代中国的十大社会阶层中,农民处于第九阶层。为此,农村劳动力具有向上流动的强烈愿望。进城务工是一个相对开放的途径,它不受法律、政策的硬性限制,只要有条件,有能力,谁都可以进城务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有1亿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务工。他们不仅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自身素质的提高、观念的转变和生活的改善找到了新途径。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日益与自身文化素质、教育程度相关联。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受教育状况显示,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只能处于社会的底层,要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效流动异常艰难。根据中国10城市调查数据^①发现,城市中不同职业阶层在受教育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平均受教育水平由高到低的职业阶层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管理阶层、办事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工人阶层和自雇佣者阶层。管理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城市社会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两个阶层。据该项调查,10城市中55%的管理阶层成员和51%的专业技术人员受过正规序列的高等教育。办事员阶层中也有40%的成员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这三个阶层中,其他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其受教育水平都在高中或中专以上。其中管理阶层中有10%的人获得过非全日制大专文凭,技术人员中有8%、办事员阶层中也有6%左右的人获得过这类文凭^②。

教育之所以影响人口的社会阶层分化,是因为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在中国,提到社会地位时通常与人们的职业相联系,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或阶级,从而也表明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而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受教育水平也往往较低。换句话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城乡职业分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是城乡人口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职业地位是社会阶层地位的内核,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低下是其职业地位近乎水平移动的原因。

钱民辉认为^③,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工作职位、人际交往也都要求教育程度。教育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着极大的作用,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由于现代社会存在着分化和分层,教育不但能促进社会分化,而且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证明,教育确实能使人们向上层社会流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教育系统与劳动领域的筛选、训练以及个体在成人职业、

^① 这项调查是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课题“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中实施的部分城市抽样调查数据,该项调查覆盖全国10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城市,收集样本4731个。转引自张利萍:《教育与劳动力流动研究》,136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6。

^② 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3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③ 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4):194-200页。